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哲学考察

——以库恩范式革命为视角

彭成义

从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建立国际政治系算起,国际关系学在当代中国已经走过近60年的历程,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不仅包括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国外国际关系学的大规模译介和学习掌握,也包括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可以说走到今天,中国国关界的学科、学派和自觉都达到了崭新高度。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虽然有关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不同进路都从各自角度挖掘了传统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而且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有一定程度的自觉反思,但是尚未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并且不够系统和深入。

而与理论创新密切相关的哲学洞见,最为直接而且被广泛引用的或许非库恩的范式转换莫属。中国国关学界对库恩的范式革命也是耳熟能详,但是对其深刻洞见能学深悟透并熟练运用对国关理论创新的观照还付之阙如。为此,本文将通过库恩的视角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新,包括构建中国学派的探索,进行一个比较严谨的哲学考察。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新与成果

(一)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新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新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虽然这种分法并非绝对,而只是大体帮助我们加以理解和把握。第一阶段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为主的阶段。标志性节点是1987年在上海首次召开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会议,会上正式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这次会议的召开被认为是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走出了非系统化的研究状态,正式进入了“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阶段。^①以梁守德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围绕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做了不少理论探讨。^②第二阶段为以“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探索和建设为主的阶段。标志性节点是进入21世纪的2000年,两位年轻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建设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主张。^③随后于2004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提出了“创建中国理论,构建中国学派”的重要倡议,这被认为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大事件之一。其后,中国国关学界围绕“中国学派”展开了诸多的讨论,议题包括其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生成路径等。如果采纳秦亚青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操作性定义,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使用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中的思想资源,对国际关系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进而形成逻辑自治的思想体系”^④,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主要指的是有关“中国学派”探索的阶段。

(二)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成果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学派”的探索取得了积极显著的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四种流派,即关系理论、共生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和天下体系理论。各种流派都发表了不少成果,包括出版了相应的代表性著作等,并引起国关学界广泛关注。下面尝试简要介绍一下它们的核心观点和内容。

① 林小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特色辨析》,《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11期。

② 参见梁守德:《论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③ 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欧洲》2000年第4期;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

④ 秦亚青:《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

关系理论流派以秦亚青为代表。其内容和观点主要体现在《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一书之中。该理论以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中的关系本体为基本假定,并以与该本体匹配的中庸辩证法为认识论依据,从关系视角审视世界秩序和行动逻辑。这种关系本体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子本体不同,它认为世界是由关系构成的,也只有在关系网中才有意义。关系理论被认为是对建构主义的发展,而其逻辑链条是:关系确定身份,身份界定利益,利益驱动行动。

共生理论流派是比较名副其实的流派,因为代表性学者不止一位,而且有比较明显的地域色彩,所以有时候也被称为“上海共生学派”。其主要是指上海国关学界围绕传统文化中的“共生”理念,阐发共生的哲学思想、东亚内生秩序对于国际关系发展的独特价值而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流派。其内部也有不同的探索方向。任晓和苏长和等主张批判吸收传统东亚内生秩序的共生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历史怪圈:结盟对抗与霸权竞争,从而探讨多极背景下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必要与可能。以金应忠、胡守钧为代表的另一方向则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共生哲学,阐发倡导国际共生的国际关系理论。其牵涉到一个同和异的问题,所以正如其中一位代表性学者所指出,“共生的要义不在于求‘同’,也不仅仅是存‘异’,而是主张在多元前提下的互动和互补中寻求建设性的发展生长”。^①可以说共生理论的适用范围是很广泛的,也很好地呼应了中国2023年向世界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主张和逻辑。

道义现实主义以阎学通为代表。该流派顾名思义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发展,主要是加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义的思想,特别是领导国的权力性质。这种权力既包括物质性权力,也包括道德性权力,相应地,国际体系的秩序会因为领导国的性质而分为王权秩序、霸权秩序和强权秩序。该理论以“国家领导”的类型解释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国际领导”的类型解释国际规范的变化。也因此,有学者描述道义现实主义为“是强调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及国际体系类变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的,即系统阐释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②该理论引入了政治领导和战略信誉两个重要变量,特别是前者,被视为战略选择以及崛起成败的核心因素。

天下体系理论以赵汀阳为代表。其核心是将中国古代周朝的世界体系视为理想类型,将其拓展到整个世界范围。其核心原则是整体原则(又曰无外原则)及家庭逻辑,所以该理论视天下为一个政治主体单位,而不是当今以个体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设计的国际。遵循家庭逻辑就应追求在家庭内部的各个个体自我利益的最小化,而总体爱心和谐最大化,这样的秩序无疑是政治秩序的最优选择。从这种理论看来,当今世界是一个“非世界”,它是一个“地理性”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制度性”的世界,后者追求在特定地区或全球建立一个整体的、无外的秩序体系或者制度体系。^③在一些学者看来,“‘无外’是天下体系理论中尤其重要的一个原则,它能够有助于我们人类消除西方思想中一个顽固病症,即基于宗教非理性的‘异教徒意识’而发展出来的‘敌人假设’”。^④这与施密特著名的将政治界定为分清敌我形成鲜明对比。

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内部前沿反思

有必要指出,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以及更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等,国关学界的前沿学者已经有不少的反思和探讨。这里梳理回顾三种大的聚焦思路。

第一种聚焦中国学派自身。比如任晓在《“中国学派”问题的再思与再认》一文中,就不仅剖析了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梳理了中国学派的贡献及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关系,而且提出了中国学派自主发展的三个境界:第一是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第二是能提出自己的独特问题;第三是能建构自己的理论。其中对美西方实证主义将“理论”过于窄化界定的具体批判等都有重要的意义。^⑤

第二种聚焦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本身。这方面卢凌宇做了不少研究和探索。在其2017年发表的《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一文中,他探讨了国际关系研究问题之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判断问题重要性的标准。顺着这种思路,卢凌宇指出国际关系学由于内生的基础性不足和简约性不够,很难

①②④⑤ 任晓:《“中国学派”问题的再思与再认》,《国际观察》2020年第2期。

③ 秦亚青:《中国国际理论发展与贡献》,《南大亚太评论》2020年第1期。

提出能够辐射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问题，因此也难以产生社会科学的“元理论”，所以建议要消除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分野，绕开“无政府状态”这个国际关系学的基本假定，运用外延更大的假定和概念来重构国际关系学。^① 在其《思想市场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如何评价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文章中，作者则进一步考察了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与思想市场需求端的关系，以及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系统评价标准等问题。^②

第三种聚焦知识生产的文化交流背景或科学观基础。这方面秦亚青进行了一些深入思考和探索。在其《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为例》一文中，他引入了知识涵化理论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生产进行了考察和解读。知识涵化是一种社会知识再生产理论，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开放性接触形成知识的相互影响并导向知识再生产，并可分为单向涵化、双向涵化和交互涵化等相互关联的阶段。秦亚青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过程更多地体现为一个知识涵化的过程，以开放性涵化起步，当前正处于双向涵化阶段，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中华性”特征。^③ 在其《知识观重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路——以三大理论批判为例的分析》一文中，秦亚青则从不确定性切入，探讨了量子科学观对经典科学观的超越给建基于其上的国际关系主流三大理论带来的冲击，从而呼吁新的知识观的构建。^④ 这是呼应了温特于2015年出版的《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中的洞见，该书的中文版已于202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述国际关系学内部前沿学者的反思，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和启发性意义。这也代表着中国国界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最高自觉。不过除了内部视角，旁观者的更为一般的哲学视角也非常重要，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楚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包括前沿学者的反省自觉等。对于“中国学派”自身的反思，梳理三个境界确实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是还有待系统和深入的剖析。对于知识生产的议题，也没有对知识本身进行解构，从而进行更加彻底的哲学批判。对于理论创新的探讨，则或多或少还是从内部的微观视角切入，并未从中跳出来进行一个更加基础和通盘的考察。比如卢凌宇聚焦的创新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库恩所言常规科学范式下的“解谜”。为此，我们下面一节将转向库恩的范式革命寻求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观照启发。

三、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与正确的打开方式

库恩的卓越贡献不只是造出一些耳熟能详的概念术语，更为主要的是揭示出确凿存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种科学不应做当今狭义的理解，其实还包括社会科学等，甚至更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生产。正如库恩研究的权威专家伊安-哈金在该书的导读中评价道，“这种结构在书中被库恩小心翼翼地展开，结构中的每一个节点都被库恩赋予了一个有用的名字”；这些节点和名字包括“常规科学”“解谜”“范式”“反常”“危机”“革命”等。^⑤ 该结构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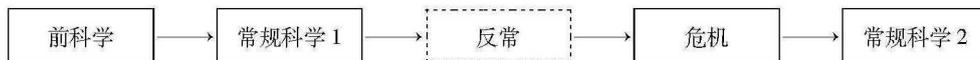


图1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为了准确地展示库恩的观点和洞见，下面将尽可能地引用他的原话，这样可以最大化地避免因转译带来的信息流失问题。此外，值得指出库恩的思想突破主要归功于他以史为鉴的能力。正如他在全书开篇指出，“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是轶事或年表的堆栈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形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⑥

① 卢凌宇：《研究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

② 卢凌宇：《思想市场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欧洲研究》2022年第2期；卢凌宇：《如何评价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8期。

③ 秦亚青：《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期。

④ 秦亚青：《知识观重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路——以三大理论批判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⑤ 伊安-哈金：“导读”，载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⑥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页。

正确打开库恩洞见的方法关键是对其概念进行一种融会贯通的灵活理解和把握。这也是历史上那些纠结于库恩中心概念“范式”不够具体确切而发起诘难的批评者所不能通达的。灵活地来看，“范式”可以有大小之分。这从库恩于1969年给其书增加的“后记”中所做的澄清就看得很清楚。范式有两方面的含义：广义是一个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狭义是“示范性的以往成就”。^①因为在广义层面来说，范式和共同体有循环论证之诘难，所以在该后记中库恩被迫做了一些补充说明，包括用“学科基质”来代替“范式”，而且明确了其核心四要素内容。^②在狭义层面，范式作为“共有的范例”被库恩看做是“书中最有新意而最不为人所理解的那些方面中的核心内容”。为此，库恩举了不少例子帮助说明，包括学生掌握了教科书的理论和规则但是对于一些习题仍感吃力，而这种困难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克服。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举一反三”的能力，这在库恩那里被解释为“只能得之于科学实践，而不是纸上谈兵”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③当然，狭义的范式只是广义的范式的子集，所以当我们太过于聚焦前者的时候就可能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而广义的范式其实和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使用的希腊语 *paradeigma* 的原意比较接近，即“演说者与听众共有着众多无需多言的信念”。^④既然无需多言，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库恩在西方学术界的氛围中被迫澄清说明本就是无奈之举，而一旦妥协也就陷入了西学规则的陷阱，所以也有认为库恩在1969年对狭义范式的补充说明纯属画蛇添足，而且使得他的理论陷入更大的风险。当然，不管怎样，库恩的深刻洞见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新都是极富启发性的，下面我们就择其要点简要讨论之。

四、库恩范式革命对中国国关理论创新的启示

（一）中国国关理论的常规研究与解谜

根据库恩的观点，“‘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这也被他称为范式下的研究，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二是“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⑤国际关系领域的三大理论无疑很典型地符合了这两个特征。在前范式阶段，“搜集事实的活动……是一种远为随机的活动……导致了科学发展早期阶段学派林立特征”。^⑥但这种“群雄逐鹿”的状态最后不可避免地被其中一支“一统江湖”，而进入范式阶段。但是这正如中文“成王败寇”成语所揭示的那样，范式会形塑问题意识以及历史资料的显与隐，毕竟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去书写的。这种演进有其必要性是“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奥的那些问题上，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个部分研究得更细致更深入”，而“不需要从第一原理出发并为引进的每一个概念进行辩护。这样的工作可以留给写教科书的人去做”。^⑦

对于常规科学下开展的工作，库恩特意赋予了一个“解谜”的称谓。这样的工作包括确定重要事实、证明理论与事实的一致性，以及阐明理论等三类，其结果是资料的详尽和观察—理论一致的精确性，但这也是常规科学唯一的价值，并“超越了它们本身并不总是很高的固有的价值”。^⑧这其实正是库恩使用“解谜”称谓的原因，因为“谜就是特殊的问题范畴，它可以用来检验解谜者的创造力或技巧。字典里的举例是‘拼图谜’（jigsaw puzzle）和‘字谜’（crossword puzzle）”。^⑨这在中文语境并不突出，但是在英语中“解谜”确实凸显了库恩眼中常规科学研究工作的无足轻重性。用一个中式的形象比喻，“解谜”就好比是工笔画，为范式的大写意填充内容和细节。但是内外视角不同，范式内部视角可能将其视为一种创新，并乐此不疲。对此，前述的卢凌宇有专文详尽分析和讨论，包括对国际关系创新的分层、分类、评判等。^⑩虽然文章中也有提及范式间创新，但是因为范式有大小之别，所以从更大的一个视野来看，这些创新都没有跳出库恩“解谜”

①②③⑤⑥⑧⑨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47、153、159—160、8、12—13、55、30页。

④ 伊安·哈金：“导读”，载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2页。

⑦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6、20页。

⑩ 卢凌宇：《如何评价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8期。

的范畴。但是这种内外之别恰似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一样，与庄子讲的孔子的反省很类似：“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庄子·大宗师》）

应该说库恩揭示的常规科学及其解谜工作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大多数的工作都是比较准确和富于启示性的。这也是中国学派呼吁者一直抱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原因。这些理论在中国这一全球知识生产的边疆地带分别吸引了不少的坚定拥护者，然后留给他们不少的扫尾工作。但是这些工作的价值通常没有这些工作者自认为的那么高。而且正如下面将要介绍，因为这些范式的前提预设本身带有随意性，所以不可避免会遭遇反常与危机，这恰恰也是中国学派得以兴起的根本原因。

（二）西方国际理论遭遇中国时的反常与危机

首先需要指出，反常的发现是一个过程，需要观察和理论的同步进行。正如库恩所举氧气被发现的例子所示，“需要有一次重要的范式修改以使拉瓦锡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也是为什么普利斯特列终其漫长的一生却未能看到它的根本原因”。^①而且这些范式内的研究者“并不把反常视作反例”，况且“谜和反例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②与此同时，“新事物总是随着困难一起凸现出来，它违反期望所提供的背景，并以抗拒来表现自己”；“这种阻力保证范式不会太轻易地被抛弃，科学家将不会轻易地被反常烦扰，因而导致范式改变的反常必须对现存知识体系的核心提出挑战”。^③

这其实牵涉从反常到危机的过程。根据库恩，“反常是如此长久和深刻，以致人们可以把它影响所及的领域恰如其分地说成是处于日益增长的危机状态中。人们不难料想，这种不安全感是在常规科学解不开它本应解开的谜的这种持续失败中产生的”。^④为了应对危机，“守成”的范式理论不得不“设计出大量的阐释并对他们的理论作特设性的修改，以消除任何明显的冲突”，而“一个理论的变形骤增，正是危机的通常迹象”。^⑤与此相伴，浸染于传统范式相对较少的年轻人可能对范式的一些基本前提预设进行一些哲学的批判，所以库恩最后总结道：“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⑥对于哲学转向的需要或可呼应文章开头提到的哲学时代的必然到来，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整个现代都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必须来一场“存在论”意义的革命。^⑦

库恩上述揭示的过程完全可以很好地解释西方主导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用于解释中国时面临的从反常到危机的过程。中国学派的兴起则是对主导范式之外的另一备选范式的供给，这对于范式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至于传统主导范式大厦的崩溃时间表，正如库恩指出，其他一些外在因素，包括社会压力，文化氛围的改变等等，“在决定崩溃的时机、在认识到崩溃的难易程度以及在特别引起注意而使崩溃首先发生的领域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⑧应该说，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所处的阶段就对应库恩这里描述的时间段，用孙中山先生的名言讲叫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阶段。

（三）国际关系理论的革命尚未成功，中国学派仍需努力

库恩用“革命”来描述范式转换并用于其书标题其实并非偶然。这里可以想到三点原因。第一，我们通常理解的政治革命和范式转换确实共享同样的逻辑和进程。第二，因为大家对政治革命的熟悉和了解，这种类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比较抽象一些的范式革命。第三，因为政治革命的形象和生动性，这有助于加强大家对范式革命的印象以及相关洞见的传播。

和政治革命的不同斗争派别一样，不同范式也存在不可通约的问题。正如库恩指出，“在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做出选择，就等于在不相容的社会生活方式间做选择……当不同范式在范式选择中彼此竞争、互相辩驳

①③④⑥⑧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48、54—55、57、78、59页。

②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66、68页。

⑤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60、67页。

⑦ 海德格尔的批判可以说是深入到本源的哲学批判，但因为更加遥远与深奥，只能留待别篇文章进行深入考察与讨论。对他有关现代的批判概要，可参阅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时，每一个范式都同时是论证的起点和终点。每一学派都用它自己的范式去为这一范式辩护”。^① 这种循环论证并不难理解，尤其是与西方传教士打过交道的读者可能体验更为深刻，因为他们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常引用《圣经》里的话，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与谈对象根本就没有共享他们认为《圣经》是真理这一前提预设。至于“为什么一种新现象或新理论的吸收，必须得放弃旧的范式”这个问题，库恩认为这是范式本质规定性决定的。^② 一方面常规科学不能兼容并同化不断出现的反常现象，而且也不可能进行“战略收缩”去禁止它们扩张到它们不能解释的范围。在库恩看来，“这些禁令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但接受了这种禁令之后，研究工作根本无法进行，科学也就无法展开了”。^③ 这也是库恩一再重点批判的错误观念，即科学是一种累积性的知识进步观念，后者是由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认识论形塑的。

也正是因为此，库恩指出范式的转换就是一种世界观的改变。“一个人所看到的不仅依赖于他在看什么，而且也依赖于他以前视觉—概念的经验所教给他去看的东西。”^④ 这其实正应了中国古人言“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的深刻智慧（《庄子·秋水》）。一个人的认知不仅受到时空的局限，更主要的还是其受到的“教化”的影响，而后者正是库恩的“范式”洞见所着重揭示的。在其书中，库恩多次强调教科书对于我们认知的影响，“科学教科书（以及如此多的老的科学史著作）只会提到一部分过去科学家的工作，即那些很容易看成对书中范式问题的陈述和解答有贡献的部分。部分由于选择，部分由于歪曲，早期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和所遵守的规则，都被刻画成与最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上的革命的产物完全相同”。^⑤ 其实库恩后来对范式作为“示范性的以往成就”狭义界定，也都是和此教化意义相关。广义的“范式”更全面，因为它涵盖了那些从学习经典成就中通过举一反三、潜移默化地掌握的不可言传的东西。

中国国关学界对于库恩有关知识生产的规律以及范式间不可通约的洞见理解和掌握得还不是很深刻，但是具有很大的潜力。这是因为从知识的角度而言，中国近代以来确实长期处于全球知识生产的边缘地带，所以很长时间都属于学徒的状态。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传统的传统也让他们在知识生产方面占尽先机和优势。但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其在前面已经界定的智慧方面明显是远远超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所能及。如果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精确和详尽，属于常规科学的范畴，那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则应擅长全面和无遮蔽。这其实和库恩所言的世界观洞见紧密相关，而中国学派的不同进路也都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至于库恩书中有关革命的解决，如何通过革命而进步等的洞见，都日益与中国智慧相连。比如中国当今向世界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其实就呼应了库恩有关范式革命不会陷入相对主义的看法。为什么不同的文明能“不齐而齐”，为什么貌似不可通约的范式转换之间其实又有一种进步的意义，这些都和中国倡导的全球文明倡议背后的哲理不谋而合。不过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回顾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 60 年的筚路蓝缕，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特别是中国学派的探索和兴起。通过库恩有关范式革命的深刻洞见的观照，我们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 innovation 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自觉。可以说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了常规研究和范式转换齐头并进的阶段。一方面，专注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范式的学者还有不少而且也出产不少“解谜”成果；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跳出这些范式的桎梏而开始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并取得重要进展。正如库恩指出，就想对弈一样，前者接受比赛规则的前提预设，所以只是聚焦自己的对弈能力，而后者则对非中性的弈棋规则提出质疑并发起挑战。不难现象，只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建立的前提预设是主观随意的，那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这种挑战就不可避免，而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厦很有可能在不期然的时候以摧枯拉朽之势轰然崩溃。这种结局既然不可避免，就让我们以平静坦然的态度耐心迎接它的到来。

[作者彭成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①②③④⑤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 80、81、86、95、115 页。